

我国居民贫困归因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程中培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结合贫困归因类型学, 利用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分析我国居民贫困归因的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总体上, 我国居民较多把贫困归因于能力不足和懒惰等个体原因, 较少强调命运或社会因素, 人们认同残障、教育低、家庭条件差和社会关系缺乏等致贫观点的比例居中。基于分类主成分分析方法, 研究发现我国居民贫困归因呈现五种类型: 个体缺陷型、命运禀赋型、个体能力型、文化禀赋型和社会制度型, 家庭禀赋可能构成新型贫困归因维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年龄、收入、社会救助、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宗教信仰及福利态度等因素对贫困归因具有显著影响, 且城乡存在一定差异, 但区域背景的影响不显著。建议进一步探究居民贫困观念形成背景, 增加贫困原因调查题项, 激发受助者内生脱贫动力和合力构建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关键词: 贫困归因; 主观贫困; 福利态度; 社会救助; 分类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1)04-0059-10

Chinese people's poverty attribution and its relevant factor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Social Survey 2017

CHENG Zhongpe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framework of poverty attribution, and using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data to measure Chinese people's poverty attribution. Statistics show that Chinese people tend to attribute poverty to individual reasons such as low ability and laziness, and few agree that destiny or social factors lead to poverty.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Chinese people's poverty attribution is presented in five types: individual defect type, destiny endowment type, individual ability type, cultural endowment type and social system type.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ge, income, social assistance, social status, education, party membership, ethnicity, religious beliefs, and welfare attitud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people's poverty attribution, but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 poverty attribution; subjective poverty; welfare attitude; social assistance; categorical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一、问题的提出

“应得和不应得”的救助二分法昭示着贫困现

象与生俱来的社会建构属性。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 社会流行的贫困观念塑造着“穷人”身份和救助资格的边界, 围绕贫困事实及其成因的主客观要素评价, 凸显于社会救助制度的权利义务关系上, 形成个人的慈善救济与国家的公共救助两种类型救助方式的分野^[1]。在贫困者是否“应得”救助的价值判断中, 人们对贫困问题产生原因的认知——即“贫困归因”具有关键影响, 不仅构成社会福利

收稿日期: 2021-07-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20YJC840016)

作者简介: 程中培(1994—), 男, 湖南茶陵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

态度的核心维度,也扮演着所在地区社会救助模式的思想根源^[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3]在我国从消除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的政策转向背景下,2020年后扶贫时期贫困治理的目标、对象和帮扶手段也面临重构与创新,多维贫困、主观贫困议题日益受到各界重视。从主观层面探究转型时期我国居民贫困观念的内在理路,有利于从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上促进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此,本文结合国外贫困归因理论和国内研究进展,利用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探讨居民贫困归因的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提供理解我国贫困现象及反贫困战略的主观线索。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自20世纪初布思、朗特里等社会调查先驱开创现代意义上的贫困科学以来,这一领域长期围绕贫困标准的测量和致贫因素等议题展开,致力于识别贫困的客观事实,但很少关注贫困作为社会现象的主观建构属性。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实现“伟大社会”计划而“向贫困宣战”之际,当代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进展和贫困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才奠定主观贫困的概念范畴,贫困归因、文化贫困等研究议题随之兴起。

1. 贫困归因类型学

在社会认知心理学谱系中,海德的归因理论把人们对事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分为两种:内因和外因;前者强调个体特质、努力和态度等内在能力因素,后者侧重任务难度、运气等外部环境因素^[4]。早期盖洛普的社会调查遵循这种二分法,贫困原因被设计为“缺乏个人努力或难以掌控的外部环境”^[5];其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缺乏努力、外部环境或二者兼有”的占比分别为31%、33%、36%。费金根据24个访谈者提炼出11个贫困原因,运用因子分析将上述原因归为三种类型:个体型(Individualistic)、结构型(Structural,也称为社会型Societal)和命运型(Fatalistic)^[6],这种三分法框

架成为贫困归因研究的元理论,国外后续研究对该框架的具体观点或稍有修正,但大多数均一再证明上述分类的稳健性,其代表性观点如下:一是个体型观点,把贫困归因于个人品质或行为缺陷,认为穷人自身的不节俭、懒惰、道德不良和酗酒等导致生活困境;二是社会型观点,主张社会制度和外部结构因素要为贫困现象负责,表现为工作岗位不足、教育机会较少、社会关系网络分层、歧视穷人等;三是命运型观点,把贫困归咎于坏运气、先天禀赋不足、甚至神的旨意等偶发性因素^[7,8]。

上述分类扼要地建构出容纳人们对各种贫困原因解释的类型学框架,但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社会型观点可以进行再分类,古丁和米德尔顿运用因子分析发现英国公众的贫困归因观点可归为“挥霍、不公平、被剥削和宿命论”四类^[9];另一方面,该三分法之外可能存在新的贫困归因类型,有研究发现围绕“贫困亚文化”观点形成的文化型归因比命运型更具代表性^[10]。

在反思贫困归因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奥斯霍特和哈尔曼注意到个体型和社会型归因中隐含着某些行动者(穷人、富人、行业或社会等)应承担责任的的前提;而命运型归因则意味着无人为此负责^[11]。通过构建“个体—社会、责任—命运”二重归因维度,他们提出贫困归因四分法框架——包括个体责任、社会责任、个体命运和社会命运(表1)。该框架也是一个理想化模型,不同观点的所在类型并非绝对,人们可能同时寻求多种原因来解释贫困。

表1 贫困归因四分法框架

维度	个体	社会
责任	个体责任型 懒惰、不节俭、道德放纵 代表性地区:比利时	社会责任型 他人行为、社会不公 代表性地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
命运	个体命运型 运气不好 代表性地区:无	社会命运型 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后果 代表性地区:丹麦

贫困归因类型学是理解贫困污名与福利态度的理论工具,各种归因观点背后存在人们对贫困(失败)事件责任分配的逻辑认知,扮演着反贫困政策各方的共同心理基础^[12]。从贫困归因三分法到四分法,贫困的责任和命运因素的定位得以厘清,但随着晚近贫困理论嬗变、发达国家“新穷人”出现和发展中国家反贫困实践,在欧美福利国家背景

下形成的贫困归因类型学也面临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思潮的挑战,探索新型归因维度是当今研究的重要方向。

2. 国外贫困归因的影响因素

个体之间的贫困观念差异是探讨贫困归因逻辑的起点。从早期研究对持有不同贫困观念人群的特征比较,到贫困归因类型学的广泛应用,欧美学界系统地研究贫困归因影响因素的类别进行归纳。在《生活质量和福祉研究百科全书》的“贫困观念”条目中,相关影响因素被划分为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价值观、意识形态、性别、种族、年龄、教育、收入和宗教等属于个体层面,国内阶级结构、社会富裕程度和发展阶段等属于社会层面^[13]。也有研究将影响因素归为五种:贫困感知、劣势经历、价值观念、社会人口特征和国家背景^[14]。本文将其归结为“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区域背景”三类特征分述之,进而提出研究假设。

社会经济特征是早期研究考察贫困观念形成条件的重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和工作状况等因素。不少文献发现,女性、年轻人、教育水平低、收入贫困和工人职业等群体更可能支持结构型贫困解释,但也有反对意见^[15]。这类变量构成社会经济地位的代表性指标,实质上隐含着归因偏差理论的“行为—观察者差异”命题^[16];即经济弱势群体倾向于外部归因,强调外部结构和无法改变的命运导致贫困;经济优势群体更可能进行内部归因,主张贫困是咎由自取。

文化心理特征旨在揭示价值观、政治态度、种族、宗教信仰和人格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贫困归因的影响。欧美地区的经验研究表明,政治保守主义者、白种人和新教徒群体倾向于个体型观点,政治自由主义者、有色人种和天主教徒群体则倾向于结构型观点并主张向穷人提供更多帮助^[17]。进一步研究发现,福利应得感、社会公正感、宗教具体态度和责任意识等变量也与人们的贫困归因观点密切相关^[18]。

区域背景特征指所在地区公众由于共同的经济社会结构、发展阶段、福利体制和历史传统等背景,形成具有地方性的流行贫困观念。具体而言,经济社会结构决定着当地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进而影响贫困作为公共议题的可见性;福利体制规训受助对象的社会身份,其“去商品化”程度

与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息息相关;地区文化和意识形态塑造着相对统一的价值观、规范和信仰体系^[14]。

3. 我国贫困归因的观念变迁

中西方古代社会流传着迥然不同的贫困观念。西方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文化倾向于把穷人塑造为正面的受难者形象,但到 16 世纪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使得贫困逐渐成为个体失败的象征而饱受道德指责;我国宋代以前的社会观念则主张贫贱与个人道德修养无关,贫困往往属于一种不幸的状况或命运,作为社会问题的穷人被认为是缺乏家族、邻里互助所致^[19]。明清以降,贫困现象逐渐与社会上负面道德评价联系起来,士绅精英主导的慈善救济活动一再强调对受助者道德品质的审视;到清末民初,部分有识之士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焦虑也被投射到穷人身上,甚至一度出现“贫穷是罪、改造穷人”等观点^[20]。

国内贫困归因研究始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洪大用根据全国范围调查发现,近七成被调查者认为贫困是穷人“自己造成的”,认为贫困是“社会的原因”仅占两成左右^[21]。个体型贫困归因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的流行观念;怀默霆在针对我国社会公平感的城乡调查中发现,人们倾向于认同“缺乏能力、学历低、努力不够和品行不良”等个体因素致贫的重要性,但对“运气不好、机会不均等、歧视与偏见”等命运型、社会型观点的认同程度有限^[22]。李静等进一步研究探讨了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人格因素对受访者贫困归因的影响^[23,24]。石丹理基于香港地区调查发现,接受社会救助群体中存在“个人问题、剥削、缺乏机会和命运”四种贫困归因类型,由于剥削和缺乏机会同属社会型观点,上述类型仍符合经典的贫困归因三分法^[25]。

总体来看,个体型贫困归因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众解释贫困原因的主流倾向,持有社会型、命运型的贫困归因观点的群体比例不高;但围绕贫困归因类型的分析很少,缺乏对新型贫困归因维度的探索;并且贫困归因的影响因素未能得到系统的考察。

4.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首先,在国外贫困归因研究中,个体型、社会型和命运型三种维度构成贫困归因类型的基本范畴,但除此之外其他贫困原因的组合也可

能产生新型归因维度,而且不同国别的贫困归因类型存在明显差异;我国独特的社会转型、福利体制和文化传统,都意味着我国可能具有不同于西方贫困归因类型的维度。其次,根据“行为—观察者偏差”命题,社会经济特征是个体贫困归因的主要影响因素,位于相对优势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倾向于把财富归因于个人努力,形成贫困的内部归因,相对弱势群体则更倾向于贫困的外部归因;因而社会经济特征整体上可视为显著且方向一致的影响因素。再次,贫困归因作为主观意识内容,与人们的文化规范、价值观等密不可分;但人的主观意识较为多元且纷繁复杂,所以对个体的贫困归因可能存在不同方向影响。最后,区域发展水平和福利体制等因素对贫困归因具有宏观、间接的作用,其影响效应可能不够明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我国居民贫困归因的类型具有独特性,可能存在个体型、社会型和命运型之外的新型维度。

假设2:社会经济因素对居民的贫困归因有显著且方向一致的影响。自身社会经济状况越好的受访者,对个体型观点的认同程度越高,但对社会型、命运型观点的认同程度越低。

假设3:文化心理因素对居民的贫困归因有显著但方向不一致影响。持有不同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和福利态度特征的受访者,对贫困归因观点的认同程度明显不同。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展开分析。该问卷的“价值观和社会公正”部分对居民贫富观念进行专项调查,符合本研究目标。具体选取问卷I3a题项构建因变量,作为贫困归因的代表性指标;剔除该变量的缺失值(拒答或回答“不知道”)后,整理得到9815个样本。

2. 变量说明

因变量。CSS2017年调查问卷的I3a题项询问受访者对贫困原因不同观点的认同程度。该题项内容为“任何社会中,都有一定比例的穷人存在,你认为穷人会陷入穷困最主要(第二主要或第三主

要)的原因是什么?(最多选3项,并排序)”,对应选项有8个观点,依次是:(1)没有能力才华(2)运气差(3)家庭条件差(4)懒惰(5)身体不好,有残障(6)教育程度低(7)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8)缺少社会关系。上述观点中,(1)(4)(5)接近个体型观点,(7)(8)符合社会型观点,(2)属于命运型观点,(3)(6)分别对应家庭禀赋和文化两个因素而可能构成新型贫困归因维度。鉴于该变量的序次性质,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重新编码,按照上述观点建立起8个贫困原因认同程度的有序变量,并赋值为1、2、3和4,分别对应“不属于陷入穷困的主要原因”“陷入穷困的第三主要原因”“第二主要原因”和“最主要原因”,赋值越高代表被访者在该观点上认同程度越高。

自变量。根据研究假设和数据特点,选取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区域背景特征等三组因素,构成影响因素分析的自变量。第一,把社会经济特征操作化为相关6个变量,重点考察性别、年龄、收入、工作、社会救助、社会地位因素与个体型、社会型贫困归因的相关关系。其中,年龄变量按出生年代分组,选取70后世代为参照项,以便比较年老与年轻世代的归因倾向差异;工作变量的其他项指“学生、丧失劳动力、离退休或从事家务”等状况;社会地位系“自评本人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所属的层次”。第二,文化心理特征选取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宗教信仰和福利态度5个变量,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代表着个体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民族、宗教信仰变量用于衡量相关价值观差异;福利态度是问卷中受访者对“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的作用”观点的认同程度,“非常同意、比较不同意”归为“同意”代表个体偏向福利态度的公平观,“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则归为“不同意”代表其偏向效率观。第三,区域背景特征主要对应地区和本地归属感2个控制变量,本地归属感是个体对“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或外地人”的回答,主要考虑流动人口因素。第四,在前述样本量(N=9815)基础上,为保留最大信息,纳入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之前,对各自变量选项的缺失值进行均值插补(mean imputation),相关说明见表2。

表 2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性别	0.442	0.497	5332	0.458	0.498	4483	1.男 0.女
年龄	3.612	1.674	5332	3.349	1.559	4483	1.70 后 2.40 后及以前 3.50 后 4.60 后 5.80 后 6.90 后
收入	9.377	1.499	5332	8.682	1.501	4483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工作	1.745	0.907	5332	1.534	0.839	4483	1.在职 2.失业 3.其他
社会救助	0.035	0.185	5332	0.065	0.246	4483	1.低保户 0.非低保户
社会地位	2.101	0.890	5332	1.925	0.891	4483	1.下 2.中下 3.中 4.中上 5.上
教育程度	3.488	1.390	5332	2.702	1.196	4483	1.未上学 2.小学 3.初中 4.高中 5.大专 6.本科及以上
政治面貌	2.670	0.670	5332	2.801	0.552	4483	1.党员 2.团员 3.群众等
民族	0.057	0.231	5332	0.100	0.300	4483	1.少数民族 0.汉族
宗教信仰	1.532	1.502	5332	1.562	1.559	4483	1.无 2.基督教 3.天主教 4.伊斯兰教 5.道教 6.佛教 7.其他
福利态度	1.679	0.513	5332	1.686	0.508	4483	1.不同意 2.同意 3.不好说
地区	1.865	0.830	5332	1.853	0.797	4483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本地归属感	0.120	0.325	5332	0.034	0.181	4483	1.外地人 0.本地人

3. 模型设定

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是已有文献提炼贫困归因类型的主要方式，旨在揭示具体贫困归因观点之间的关系，进而构建贫困归因类型学。鉴于该因变量的有序多分类性质，采用 SPSS22.0 软件，运用分类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数据降维，从已有 8 个贫困原因选项中提取相应的主成分集合，归纳贫困归因类型。

根据分类主成分分析结果，本文以提取的相应主成分得分作为受访者对该贫困归因类型的认同程度指标，分别构成新的连续型因变量；然后，结合前述自变量说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城乡居民在各个贫困归因类型上认同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该模型设定如下：

$$Y_j = \alpha + \sum_{i=1}^n \beta_i X_i + \varepsilon$$

上式中， Y_j 代表受访者在第 j 个贫困归因类型上

的认同程度， α 为截距项， x_i 为各自变量（即影响因素）， n 为自变量个数， β_i 为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ε 为回归的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我国居民贫困归因的特征和类型

表 3 为我国居民贫困归因特征的统计结果。首先，借鉴已有研究的权重设置^[20]，将贫困原因解释的前三选项按照 5 3 1 赋予权重，根据加权得分进行排序（得分 $D=5 \times A+3 \times B+C$ ）。在诸多贫困原因中，我国受访者认同贫困最主要的原因依次为“没有能力才华”“懒惰”“教育程度低”“身体不好，有残障”“家庭条件差”“缺少社会关系”“运气差”和“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该排序结果与第二主要原因、以及加权得分结果基本一致。

表 3 个体陷入穷困最主要（第二主要或第三主要）的原因（N=9815）

贫困原因	A 最主要(%)	B 第二主要(%)	C 第三主要(%)	D 加权得分	总体排序	城市排序	农村排序
没有能力才华	29.03	15.65	14.93	207.03	1	2	1
懒惰	27.94	17.06	10.99	201.87	2	1	2
身体不好，有残障	10.79	19.77	14.43	127.69	3	4	3
教育程度低	10.90	15.53	19.47	120.56	4	3	5
家庭条件差	10.68	14.27	13.33	109.54	5	5	4
缺少社会关系	4.15	7.17	15.62	57.88	6	6	7
运气差	3.66	7.71	6.59	48.02	7	7	6
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 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	2.86	2.84	4.65	27.47	8	8	8

总的来看,个体型贫困归因仍是居民贫困观念的主流观点,超过半数的人认同“没有能力才华”“懒惰”和“教育程度低”扮演着陷入贫困最主要或第二主要的原因。社会型观点占次要位置,仅在陷入贫困第三主要的原因排序中“缺少社会关系”的比重为15.62%,排在该项之二(之一为“教育程度低”);并且各项排序显示受访者认同“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的比例最低。受访者认同命运型观点的比例偏低,“运气差”在陷入贫困最主要(第二主要或第三主要)的原因排序中,占比均不到8%。城乡居民贫困归因的倾向大致相同;比较而言,城市居民更强调懒惰、教育程度低等致贫原因,农村居民相对重视能力不足、身体不好和家庭条件差等观点。

表4为贫困归因类型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借鉴已有文献^[26],经过不同提取结果比较,本文选取主成分维度为5个,保留主成分具备大于或接近1的特征根,其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8.691%,基本可以代表整个相关变量的变化;克朗巴哈系数值为0.961,表明内部一致性较高。

从表4结果来看,维度1和维度3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型贫困归因倾向。前者在“懒惰”和“身体不好,有残障”观点上正值较大,但在“缺少社会关系”观点上负值较大;后者在“没有能力才华”观点上正值较大,但在“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观点上负值较大。综上,维度1和维度3倾向于个体型观点,把贫困视为个体无能、生理缺陷和懒惰的结果,故根据其特征分

别命名为“个体缺陷型”和“个体能力型”;而且,上述维度均显示出否认社会型观点的倾向。

维度2和维度4二者在“家庭条件差”观点上正值较大,均表现为强调由于家庭禀赋导致个体陷入贫困的观点,显然难以被“个体—社会”式归因类型完全涵摄,也不等同于命运型贫困归因,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本研究认为,原生家庭条件对个体的先天禀赋、后天发展的制约兼具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的特点,从代际赓续上把时间维度纳入了贫困归因类型学之中,因此家庭禀赋因素的独特性可能构成新的贫困归因类型。本文把这种归因倾向命名为“禀赋型”,凸显我国居民贫困归因受到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和“家庭本位”文化的影响。具体来看,维度2主要包括贫困由家庭禀赋和命运注定的观点,倾向于否认“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关系”导致贫困;维度4涵盖由教育不足和家庭条件差而致贫的解释,倾向于否认命运型归因观点。因此,本文认为对运气因素的认同使得维度2具备命运型归因特征,命名为“命运禀赋型”;与之相比,维度4则同时显示出文化资本(即教育程度)不足的致贫原因,命名为“文化禀赋型”。

维度5在“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观点上具有较大正值,但在“运气差”观点上具有较大负值。这种归因倾向具有批判外部结构和制度环境导致贫困问题的特征,而且否认命运型归因,属于明显的社会型观点,故命名为“社会制度型”。

表4 贫困归因类型的主成分分析结果(N=9815)

贫困原因	主成分维度				
	1 个体缺陷型	2 命运禀赋型	3 个体能力型	4 文化禀赋型	5 社会制度型
没有能力才华	-0.201	-0.004	<i>0.888</i>	-0.046	0.387
运气差	-0.019	<i>0.506</i>	0.163	-0.542	-0.551
家庭条件差	-0.339	<i>0.591</i>	-0.240	<i>0.546</i>	-0.147
懒惰	<i>0.709</i>	-0.426	-0.113	-0.199	-0.160
身体不好,有残障	<i>0.694</i>	0.290	-0.191	0.246	0.260
教育程度低	-0.347	-0.657	-0.032	<i>0.412</i>	-0.292
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	-0.269	0.052	-0.470	-0.313	<i>0.573</i>
缺少社会关系	-0.477	-0.200	-0.368	-0.407	-0.007
特征根	1.560	1.346	1.280	1.128	0.983
累计方差贡献率(%)	78.691				
克朗巴哈系数值	0.961				

注:表中采取主成分荷载系数绝对值大于0.4为临界值,并标为斜体。

2. 我国居民贫困归因的影响因素

采用 STATA14.0 软件对前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5 和表 6 所示。同时,对各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自变量 VIF 值均低于 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未列出检验结果。模型 1—模型 5 的因变量分别对应城乡受访者在个体缺陷型、命运禀赋型、个体能力型、文化禀赋型和社会制度型贫困归因上的认同程度。

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对贫困归因类型的认同倾向总体上符合归因理论中“行为

—观察者差异”逻辑,即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更倾向于认同个体型观点、否认社会型观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归因倾向则与之相反;但性别和年龄的个别变量系数方向不一致。而且,社会经济特征中多数自变量达到 5%显著水平以上,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在文化心理特征和区域背景特征方面,结果显示,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宗教信仰和福利态度对受访者在部分贫困归因类型上的认同程度具有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但区域背景特征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

表 5 城市居民贫困归因的影响因素模型 (N=5332)

变量名	模型1 系数	模型2 系数	模型3 系数	模型4 系数	模型5 系数
性别	-0.091*** (0.029)	-0.039 (0.027)	-0.039 (0.029)	-0.082*** (0.029)	0.049* (0.029)
年龄(70后)					
40后及以前	0.211*** (0.078)	0.196** (0.079)	0.042 (0.080)	-0.153** (0.075)	-0.076 (0.087)
50后	0.114** (0.046)	0.286*** (0.046)	0.021 (0.047)	-0.057 (0.048)	-0.100** (0.048)
60后	0.077* (0.043)	0.194*** (0.040)	0.030 (0.042)	-0.059 (0.043)	-0.039 (0.042)
80后	-0.220*** (0.047)	-0.135*** (0.042)	-0.104** (0.046)	0.074* (0.044)	-0.037 (0.045)
90后	-0.211*** (0.059)	0.066 (0.055)	-0.077 (0.062)	0.052 (0.062)	-0.029 (0.058)
收入	0.009 (0.010)	-0.035*** (0.009)	0.010 (0.010)	-0.006 (0.011)	-0.035*** (0.011)
工作(在职)					
失业	-0.026 (0.044)	0.090** (0.043)	-0.057 (0.047)	0.026 (0.047)	-0.011 (0.047)
其他	-0.046 (0.038)	0.002 (0.032)	-0.011 (0.035)	0.036 (0.034)	0.008 (0.034)
社会救助	-0.065 (0.068)	0.079 (0.076)	-0.025 (0.072)	0.022 (0.067)	-0.021 (0.083)
社会地位	0.058*** (0.016)	-0.065*** (0.015)	0.044*** (0.016)	0.040** (0.016)	-0.060*** (0.017)
教育程度	0.006 (0.013)	-0.114*** (0.012)	-0.028** (0.013)	-0.004 (0.013)	-0.012 (0.014)
政治面貌(党员)					
团员	-0.098 (0.071)	-0.074 (0.065)	0.104 (0.075)	-0.046 (0.072)	-0.156** (0.067)
群众等	-0.018 (0.048)	0.117*** (0.042)	-0.032 (0.047)	-0.133*** (0.046)	-0.050 (0.045)
民族	0.073 (0.063)	0.050 (0.061)	0.009 (0.063)	0.075 (0.059)	-0.117* (0.064)
宗教信仰(无)					
基督教	0.147* (0.077)	0.033 (0.072)	-0.095 (0.077)	-0.089 (0.083)	0.172** (0.082)
天主教	-0.455** (0.223)	0.198 (0.270)	-0.779*** (0.227)	0.166 (0.295)	0.093 (0.303)
伊斯兰教	-0.064 (0.173)	-0.389** (0.140)	-0.087 (0.171)	0.039 (0.157)	-0.004 (0.152)
道教	0.044 (0.237)	-0.027 (0.187)	0.157 (0.201)	-0.227 (0.232)	-0.070 (0.181)
佛教	-0.001 (0.051)	0.018 (0.049)	0.009 (0.055)	-0.137*** (0.051)	-0.009 (0.055)
其他	-0.091 (0.114)	0.316** (0.125)	0.122 (0.110)	0.050 (0.134)	-0.097 (0.130)
福利态度(不同意)					
同意	-0.166*** (0.029)	0.119*** (0.027)	-0.035 (0.029)	-0.063** (0.029)	0.041 (0.029)
不好说	-0.111 (0.088)	0.018 (0.089)	-0.114 (0.095)	0.033 (0.100)	-0.051 (0.080)
地区(东部)					
中部	0.058* (0.033)	0.009 (0.031)	-0.0001 (0.033)	-0.057* (0.033)	-0.049 (0.033)
西部	0.007 (0.034)	0.001 (0.032)	-0.017 (0.034)	-0.076** (0.034)	-0.048 (0.034)
本地归属感	-0.034 (0.044)	-0.038 (0.040)	-0.020 (0.045)	-0.036 (0.044)	0.037 (0.044)
常数项	-0.072 (0.119)	0.503*** (0.111)	0.016 (0.021)	0.183 (0.123)	0.568*** (0.126)
R ²	0.035	0.118	0.010	0.014	0.014

注:***, **, *分别表示 1%, 5%, 10%显著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6 农村居民贫困归因的影响因素模型(N=4483)

变量名	模型1 系数	模型2 系数	模型3 系数	模型4 系数	模型5 系数
性别	-0.084 ^{**} (0.031)	-0.110 ^{***} (0.031)	0.034(0.032)	-0.011(0.032)	0.010(0.032)
年龄(70后)					
40后及以前	0.135 [*] (0.079)	0.127(0.083)	0.014(0.077)	0.018(0.083)	-0.196 ^{**} (0.080)
50后	0.134 ^{***} (0.044)	0.142 ^{***} (0.044)	0.050(0.045)	-0.089 ^{**} (0.045)	-0.019(0.045)
60后	0.070(0.043)	0.155 ^{***} (0.042)	-0.039(0.044)	0.0005(0.043)	-0.044(0.044)
80后	-0.202 ^{***} (0.056)	-0.073(0.054)	-0.165 ^{***} (0.056)	-0.045(0.054)	-0.041(0.056)
90后	-0.267 ^{***} (0.071)	-0.098 ^{**} (0.066)	-0.144 ^{**} (0.070)	0.174 ^{**} (0.068)	-0.055(0.067)
收入	0.011(0.011)	-0.037 ^{***} (0.011)	0.010(0.011)	-0.010(0.011)	-0.026 ^{**} (0.011)
工作(在职)					
失业	-0.003(0.056)	0.069(0.055)	0.021(0.056)	-0.023(0.055)	-0.047(0.057)
其他	-0.146 ^{***} (0.038)	-0.006(0.037)	-0.049(0.038)	-0.004(0.040)	-0.075(0.039)
社会救助	-0.076(0.054)	0.181 ^{***} (0.060)	0.089(0.062)	0.215 ^{***} (0.063)	0.069(0.059)
社会地位	0.097 ^{***} (0.017)	-0.068 ^{***} (0.017)	-0.020(0.017)	-0.024(0.017)	-0.017(0.018)
教育程度	0.005(0.016)	-0.117 ^{***} (0.015)	-0.026 [*] (0.016)	-0.025(0.016)	0.025(0.015)
政治面貌(党员)					
团员	-0.125(0.099)	-0.126(0.087)	0.119(0.098)	-0.178(0.098)	-0.181 ^{**} (0.088)
群众等	-0.064(0.059)	0.041(0.057)	0.030(0.059)	-0.148 ^{***} (0.056)	0.006(0.054)
民族	0.113 ^{**} (0.054)	0.099 [*] (0.056)	0.009(0.055)	0.205 ^{***} (0.053)	0.087(0.054)
宗教信仰(无)					
基督教	-0.020(0.108)	-0.034(0.093)	0.102(0.090)	0.071(0.102)	0.050(0.092)
天主教	-0.328(0.418)	0.684(0.455)	0.511(0.589)	-0.589(0.403)	-0.218(0.568)
伊斯兰教	-0.185(0.122)	0.111(0.141)	-0.127(0.129)	-0.083(0.138)	-0.383 ^{***} (0.133)
道教	0.225(0.175)	0.226(0.179)	0.224(0.229)	0.035(0.275)	-0.249 [*] (0.146)
佛教	-0.044(0.058)	-0.113 [*] (0.061)	0.124 ^{**} (0.059)	0.162 ^{***} (0.055)	-0.086(0.057)
其他	-0.133(0.094)	-0.073(0.113)	-0.062(0.103)	-0.133(0.105)	-0.094(0.099)
福利态度(不同意)					
同意	-0.066 ^{**} (0.031)	0.035(0.030)	-0.099 ^{***} (0.031)	-0.029(0.032)	0.011(0.031)
不好说	-0.007(0.097)	0.002(0.104)	0.008(0.096)	0.018(0.101)	-0.010(0.099)
地区(东部)					
中部	-0.027(0.035)	-0.018(0.034)	-0.005(0.035)	0.041(0.035)	0.005(0.035)
西部	0.006(0.037)	-0.018(0.037)	0.014(0.038)	0.029(0.038)	-0.013(0.038)
本地归属感	-0.117(0.082)	-0.066(0.083)	-0.093(0.084)	-0.094(0.086)	-0.075(0.083)
常数项	-0.073(0.127)	0.829 ^{***} (0.125)	0.102(0.127)	0.349 ^{***} (0.125)	0.259 ^{**} (0.128)
R ²	0.038	0.086	0.014	0.017	0.010

其一, 性别和年龄因素。一般而言, 男性和老一辈世代群体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 其相对于女性和年轻世代更可能倾向于赞同贫困的内部归因且否认外部归因。研究发现, 性别上, 男性更可能不认同个体缺陷型归因, 且农村男性、城市男性分别更倾向于不认同命运禀赋型、文化禀赋型归因, 但城市男性对社会制度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高。年龄上, 与70后世代相比, 60后及以前世代对个体缺陷型、命运禀赋型归因具有较高认同程度; 但80后、90后世代的贫困归因与老一辈相反, 年轻人倾向于不认同个体缺陷型和个体能力型归因; 可能是老一辈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较好、以及儒家文化“知天命”的传统, 年轻人则由于缺乏经历和面临较大外部压

力, 导致其更倾向于外部归因。

其二, 收入、工作和社会救助因素。收入上, 经济收入较高者更可能对命运禀赋型和社会制度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低。工作上, 与在职者相比, 城市失业者倾向于认同命运禀赋型归因, 农村其他人员对懒惰和残障致贫的观点认同程度较低, 反映失业和非劳动力者有强调运气、回避个人责任的归因倾向。社会救助上, 与非低保户相比, 农村低保户对命运禀赋型和文化禀赋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高, 表明农村低保户重视命运、家庭和教育等归因观点, 但未发现城市低保户与非低保户的显著差异。

其三, 社会地位因素。自评社会地位较高者更可能对个体缺陷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高, 但更可能

不认同命运禀赋型；而且，自评社会地位较高的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认同个体能力型和文化禀赋型归因，但否认社会制度型，表明城市社会地位较高者具有明显的贫困内部归因倾向，相比农村类似群体更重视贫困的教育因素。

其四，教育、政治面貌和民族因素。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可能对命运禀赋型和个体能力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低，而且不认同把贫困归咎于个人能力，凸显着教育促进个体摆脱“听天由命”观念的积极影响。其次，与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的相比，党员对社会制度型归因具有较高认同程度；与其他群体相比，党员更倾向于认同文化禀赋型；以上表明党员重视贫困的教育、社会因素。与汉族相比，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对个体缺陷型、命运禀赋型和文化禀赋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高，城市地区少数民族更可能不认同社会制度型归因，其余未发现显著影响；表明城市地区民族之间贫困归因较为相似，但农村地区则有较大差异，可能是由部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和“文化堕距”所致。

其五，宗教信仰和福利态度因素。与无宗教信仰者相比，佛教徒贫困归因差异最大，农村佛教徒更倾向于认同个体能力型和文化禀赋型归因，但否认命运禀赋型，城市佛教徒更可能不认同文化禀赋型归因；在城市居民中，基督教徒更可能对个体缺陷型和社会制度型归因具有较高认同程度，天主教徒更可能不认同个体缺陷型和个体能力型归因，持有其他宗教信仰者更可能认同命运禀赋型归因；在农村居民中，伊斯兰教徒和道教徒更可能对社会制度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低。上述变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宗教信仰背景下群体的贫困观念分化，值得引起相关宗教研究注意。与主张社会保障效率观的受访者相比，主张公平观的更可能不认同个体缺陷型归因；其中，城市地区主张公平观的更可能把贫困归因于命运而否认教育因素，农村地区主张公平观的更不认同个体能力型归因；概言之，持有福利态度公平观的受访者可能不认同贫困内部归因。

其六，地区和本地归属感因素。研究仅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城市居民对个体缺陷型归因的认同程度较高、中西部城市居民更可能认同文化禀赋型归因，其余大部分选项对居民贫困归因类型的影响不显著，侧面表明我国贫困观念的地区差异较小。

五、结论及讨论

结合贫困归因类型学，利用 2017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居民贫困归因的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总体上，我国居民较多把贫困归因于能力不足和懒惰等个体原因，较少强调命运或社会因素，人们认同残障、教育低、家庭条件差和社会关系缺乏等致贫观点的比例居中。基于分类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我国居民贫困归因呈现五种类型：个体缺陷型、命运禀赋型、个体能力型、文化禀赋型和社会制度型，家庭禀赋可能构成新型贫困归因维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收入、社会救助、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宗教信仰及福利态度等因素对贫困归因具有显著影响，且城乡存在一定差异，但区域背景的影响不显著。综上，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在贫困归因特征上，以往文献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为普通人带来更多竞争机会和上升渠道，社会上存在视穷人为市场化和现代化失败者的观点，倾向于把贫困归咎于能力不足和懒惰等个人品质缺陷。我国居民的个体型贫困归因既可能来源于儒家文化中强调个体责任和自我内省的一面，也可能受到宏观地域背景因素的影响——在东亚地区生产主义式福利体制下，家计调查型救助项目和较低的保障水平容易强化“不应得”救助的社会观念。今后研究可以从思想渊源、历史传统和福利体制等层面深入探究我国居民贫困归因的形成背景。

其次，在贫困归因类型上，人们的贫困归因具有多维性、复合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受访者同时赞成多种类型的归因观点并不鲜见。尽管国外文献归纳出个体型、社会型和命运型等类型观点，但我国贫困归因并非完全遵循上述类型学框架，由“家庭条件差”导致的禀赋型观点可能构成符合我国语境的贫困归因新维度。这既反映我国“家庭本位”传统的浓厚影响，也可能与近年来社会上“富二代、穷二代”等代际现象有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值得引起重视。进一步定位禀赋型观点的归因属性仍需要更多理论辨析和调查证据，未来我国贫困归因调查量表也有必要纳入更多原因题项、增强测量效度。

最后，在贫困归因影响因素上，城乡居民对各贫困归因类型的认同差异，其背后既为“行为—观察者偏差”所决定，也受到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从

社会救助模式来看,个体型观点注重个人责任和工作伦理,支持“治贫先治愚”和“以工代赈”,而易忽视贫困群体面临的“福利污名”和“社会排斥”;社会型和命运型观点强调外部环境及风险因素,对应普遍保障和制度型福利,但可能滋生“福利依赖”和“贫困陷阱”。基于实证结论,2020年后扶贫时期的反贫困政策应重视贫困治理的主观因素:一方面,积极引导舆论观念环境,实施心理救助和情感救助,促进贫困群体社会融入,激发受助者内生脱贫动力^[27];另一方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借鉴贫困归因方式,找准“穷根”、精准施策,从个体、家庭、社会和外部环境等层面合力构建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注释:

- ① 关于分类主成分分析方法介绍和模型设定,详见 IBM Knowledge Center 网站 SPSS 对应栏目内容,网站链接: https://www.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zh/SSLVMB_subs/statistics_mainhelp_ddita/spss/categories/idh_cpca.html

参考文献:

- [1] 齐美尔.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 林荣远,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76-414.
- [2] 苏黛瑞. 社会救助的根源: 对福利体制、目标与方法之差异的初步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1): 6-15.
- [3]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216.
- [4] HEIDER 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58: 89-96.
- [5] ALSTON J, DEAN K. Socioeconom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recipients and the causes of poverty[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72, 46(1): 13-23.
- [6] FEAGIN R. Poverty: We still believe that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J]. Psychology Today, 1972(6): 101-110.
- [7] FEATHER N T.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in Australian and American samples: The person, society, or fate?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74, 26(3): 199-216.
- [8] Nasser R, Abouchedid K, Khashan H.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comparing three national groups: Lebanon, Portugal and South Africa[J].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7): 101-118.
- [9] Goulding P, Middleton S. Images of Welfare: Press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Poverty[M]. Oxford: Blackwell, 1982: 196.
- [10] Cozzarelli C, Wilkinson A V, Tagler M J.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and attributions for poverty[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1, 57(2): 207-227.
- [11] Oorschot W V, Halman L. Blame or fate, individual or social?[J]. European Societies, 2000, 2(1): 1-28.
- [12] Weiner B, Osborne D, Rudolph U. An attributional analysis of reactions to poverty: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giver and the perceived morality of the receiver[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1, 15(2): 199-213.
- [13] Michalos Alex C.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M]. Springer, 2014: 356-357.
- [14] Lepianka D. Are the Poor to be Blamed or Piti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pular Poverty Attributions in Europe[D]. Tilburg: Tilburg University, 2007.
- [15] Niemela M.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in Finland[J]. Acta Sociologica, 2008, 51(1): 23-40.
- [16] 吴胜涛, 张建新. 贫困与反贫困: 心理学的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6): 987-992.
- [17] Costa P, Dias, José G. What do Europeans believe to be the causes of poverty?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within and between countrie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5, 122(1): 1-20.
- [18] BERGMANN A, Nathan R.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eliefs uniquely predict poverty attributions[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9, 32(4): 459-485.
- [19]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3-18.
- [20] 周凤华. 中国人贫穷救助观念的转变与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6): 36-45.
- [21] 李强. 中国扶贫之路[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255-293.
- [22] 怀默霆.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J]. 社会学研究, 2009(1): 96-120.
- [23] 李静.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心理归因研究[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126-128.
- [24] 胡荣, 林兆琦. “个人贫穷论”和反贫困——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对贫困归因的影响[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0(6): 53-60.
- [25] SHEK D L. Chinese people's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The perceived causes of poverty scale[J].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003, 13(5): 622-640.
- [26] 林海明, 杜子芳. 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J]. 统计研究, 2013(8): 25-31.
- [27] 林闽钢. 激活贫困者内生动力: 理论视角和政策选择[J]. 社会保障评论, 2019(1): 119-130.

责任编辑: 黄燕妮